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

张振鵠

九一八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动手用武力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是一场局部的侵华战争，短短几年，到七七、八一三就发展成全面的侵华战争。历史已经证明，有了九一八，就必然会有七七：当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奉天北大营时，它也就向通往卢沟桥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今天，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时，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条路是怎样一步紧接一步走过来的，里面颇有一些教训。

九一八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七七之后不久发生了八一三，每一次都是日本在中国北方一地制造事变，随后又在南方的上海挑起衅端。此一历史现象值得注意。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具有某种深层的含义，蕴含着某种道理？很值得做一点探讨。

分离满蒙：从九一八到一二八

九一八发生于1931年，6年后的七七前夕，担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忽然追忆起在“满洲”这块土地上“创业”之不易，他意味深长地说：“满洲之有今日”，乃是“日本朝野倾注心血”“三赌国运”的结果。^①所谓“三赌国运”，指的是三场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战争。就以战争为赌博以求侵入、争夺、占有东三省来说，日本的确经历了这“三赌”。但如果追溯日本社会中向东三省扩张的思想渊源，则已是很久远了。幕末时期思想家佐藤信渊的一段话最为典型，他写道：“凡经略

^① 转引自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他邦者，必由其弱而易取处始。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国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① 甲午一战，无非是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发动，而日俄战争则使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日俄战争以后，开始了日本大力“经营南满”的时期，东三省南部日本势力日益增长。不久发生了两个事件使东三省潜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第一件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多年来日本统治阶级所谓的“满韩问题”中的“韩”归入日本版图，“满”既与朝鲜毗连，唇亡齿寒，其地位突出起来，所受的压力随之大增。^② 第二件是1915年日本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南满、东蒙是其中的重点，日本必欲囊括这里的全部利权而后快，此一根本目标已昭然若揭。在此前后，日本军部、浪人等两次（1912年，1916年）策动、援助逊清顽固派武装暴乱，进行“满蒙独立运动”，这实际上是阴谋分裂东三省的早期尝试。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分离满蒙”作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式确定了下来。

关于这个政策的内容实质，重光葵是这样概括的：“关于满洲问题，田中大将的方针是：将满洲看作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由日本与当地的实权者张作霖之间来加以解决。因此，田中大将……希望张作霖由于日本的援助，固守住东三省得到事实上的独立。这样张即可与中央分离，同日本建立特殊关

① 在佐藤信渊的谋划中，“征满洲”是征中国的第一步，而征中国又是“制他邦”的第一步，他又写道：“故我国而欲制他邦，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始。”转引自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171页。

② 当时载洋的弟弟、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就此写道：“日人将有大不利于我之举动，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窃恐〔朝鲜〕覆辙之虞，祸在眉睫。”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6卷，第18页。

系，按照日本的希望解决满洲问题了。”^①这个政策制订于1927年，一方面是反对山海关内外中国的统一，使东三省“得到事实上的独立”；一方面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把东三省置于日本的卵翼之下。此后几年，日本花了很多大力气欲使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己所用，都没有成功，而其军事当局酝酿、准备侵占东三省的计划渐趋成熟，于是以其国运作第三赌：九一八事变由此发生。

日本侵略军铁蹄所至，蹂躏了东三省的土地，也破坏了东三省的政权，东三省实际上已被分离出去。这时的重大问题是日本将怎样建立自己的统治。可以设想的统治形式不外三种：一、设定名义上仍属中国而事实上由日本控制的特殊地区，建立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二、制造名义上的“独立国”，由日本操纵其内政外交；三、实行吞并，如同朝鲜一样纳入日本版图。第一种主张在日本一些外交官中曾有酝酿，那实际上是前述田中义一分离满蒙的方策。但这种办法此时已不见容于军方，因而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②第三种主张一度为一部分军人所坚持，但终因风险太大，枉格难行，而未被采纳。结果就是筹建“满洲国”，以此办法分离满蒙，其彻底性与直接吞并相差无几。

但是以割裂中国这块富饶而地位重要的土地建立伪国，并非没有困难。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无法无天的侵略行径不但在中华民族中播下了深仇大恨，在国际上也引起一片谴责；东三省问题

① [日]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20—21页。译文据原书《昭和の动乱》上卷34页作了改动。

② 九一八时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有此主张，并曾向1932年1月就任外相的芳泽谦吉提出。他在遗稿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此时此刻，首先必须做出决定的重大问题是，不管表面如何，实质上已归入我国掌握之中的满洲，究竟如何处理。关东军……似乎订有计划，想要拥立宣统皇帝，制造一个‘独立国’。……〔这〕必将成为一个过重的负担，利少弊多，为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倒不如不用独立国的名目，使其在事实上同南京及关内政权绝缘……在我国的援助下实行自治，才最为有利。”“新外相完全同意我的这个意见。”“然而敢于公开出面大声疾呼，反对独立的人，竟然没有出现。”见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65页。

成为中日矛盾的中心，也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世人的注意力从这里引开，决定在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侵华利害关系最大的上海制造事端，引发新冲突，于是有所谓日本日莲宗和尚在上海遇害的事件，有日侨青年袭击上海三友实业公司总厂事件等，并由此导致了日军在上海点燃战火，这就是一二八事变。关于这一切，事变的点火人、上海日本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少佐对人直言不讳叙述了来龙去脉：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是我。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9月18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11月中旬，大体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

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问：那就是，想个办法，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引起纠纷，使外国的注意力引到那方面去，而在暗地里使满洲独立起来。……

田中：就是这样。

问：结果，是办成功了。……

田中：是的。于是，在3日1日建立了满洲国。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非常恳挚的感谢信。……我被称赞了一番。①

诚然，一二八事变的发生还有其他原因，如日本海军看到陆军在东三省冒险成功，也在上海跃跃欲试，要开辟新的侵华战场以显示自己；日军攻击上海兼可对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直接威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51页。

胁①，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配合在东三省的侵略。正是上海战争激烈进行期间，日本在东三省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从指使汉奸宣布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区完全独立”，到发表“建国宣言”、建立伪满洲国及溥仪就任“执政”，一气完成，充分说明所谓满洲国乃是日本侵略军既在东三省又在上海制造的血和火中产生的。

日本统治下的伪满的建立，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创伤，对日本则是在大陆上分离中国领土的第一个成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条路走通了，就决心继续走下去。从此，割裂中国、分而治之，就成为他们一切侵华活动的集中点及其在华建立霸权的基本形式。由此而来的就是中日关系中一个危机接连一个危机。

侵占热河，越过长城

日本侵略者要侵占热河省，这是他们制造九一八事变、阴谋占领关外地区的整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组建伪国的各种方案中，没有一个不是把热河与奉、吉、黑三省并列，划入伪国的“行政区划”之中。② 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伪政府成员名单中还包括了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长”③，其含义显然是把热河作为伪满洲国的一省，并企图以高官厚禄把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引诱出去，使日本不战而得热河省。此时日本一面设法拉拢汤玉麟，一面开始筹划直接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由于东三省各地特别是北部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十分活跃，吸住了侵华日军的主力，才使其一时不能分兵用于大规模对热河作战。但它迟早必定进攻热河，可说是尽人皆知。

① 淞沪战争爆发第三天，国民政府就迁往洛阳，可见其所受震动之大。

② 参阅〔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228—229页，248—256页，332—333页等。

③ 日本原拟以袁金铠为伪“参议院副院长”，后来（1932年3月6日）确定伪满“最后人事”时，改为以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同上，第395页，407—408页。

1933年1月1日夜，日军在山海关挑衅，3日占领临榆县城。这成为日军新的侵略行动的前奏。此后一个月间，日本军事、外交当局接连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是“满洲国”一部分的老调，宣称关东军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2月上旬关东军制定《热河经略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21日侵热行动开始。日军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3月4日，一支仅百余人的小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省会承德。短短时间内，日军控制了热河省，从此这里也归入了“满洲国”的领域。

但战争并没有就此停止，紧接着战火又从长城以外烧向长城以内，侵略热河之战发展为进逼长城、攻击长城各口之战，这成为日本侵略势力由关外向关内推移的枢纽。

长城之战开始于3月5日冷口的争夺，很快扩展到各口。可见日军占有热河之日，也就是进攻长城之时。中国守军一反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及热河之战中的无力抵抗，在长城全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屡挫敌锋。日军在各口不能得逞，4月初重点侵入滦东地区，战争烽烟延燃至长城以内河北省境。

从攻击长城到进军滦东，表明日军侵华战争的一再升级。然而这个作战的意义不限于军事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这是日本问鼎华北的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向中国施加重压，配合在华北内部的一项重大阴谋活动而给予有力推动。

原来日本在军事进攻热河同时，还制定了一项策动华北内变的“谋略”，执行人就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到处制造事端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少将。^①他于2月间到天津秘密设立了拥有幕僚多人的特务机关，在日本参谋本部指挥下，以北平、天津、河北为重点，着手开展策动内变的活动。所

^① 关于板垣此项活动的叙述，参阅〔日〕岛田俊彦、宇野重昭《太平洋战争八〇年(3)：日中战争(上)》，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19页以下；梁敬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11页以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3页以下。

谓策动内变，就是在中国内部寻找代理人酿制变乱，以反对蒋介石为号召，在华北制造亲日政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他物色的对象包括各种反蒋派及非蒋派，主要是旧军阀、失意政客及民族败类，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重金收买。他收买到的主要人物是原皖系重要成员张敬尧，此人自称与宋哲元、张作相、方振武、孙殿英、张廷枢等都熟识，因而受到板垣的重视。此时日本入侵华北的基本战略是“谋略为主，作战为副”，长城作战应支持、配合板垣的谋略活动，为此双方之间保持着经常联系。4月18日板垣向关东军密报：张敬尧预定21日夜在北平发动政变，宋哲元响应，阻止从北平撤离的中央军，请关东军监视宋哲元部的行动，

“如在发动之后彼军队依然在阵地不动，可适当予以炮击威胁之”。^①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得报立即以军事进攻响应。由于其时（19日）恰值日军进驻滦东一事受到天皇责问，武藤不能再在滦东进军（相反却不得不下令军队由那里撤出），便专注于命令第八师团向古北口以南地区发起进攻。21日拂晓攻击开始。23日关东军将南天门激战情况通报板垣，以便他利用此情势加紧活动，并要求他报告21日以来的“施策情况”。^②24日板垣致电关东军，对其在古北口进攻为他贯彻施策提供了绝好机会表示感谢，并报告说已与张作相联络成功，张将以滦东的东北军支援北平，于26、27日前在天津、北平共同起事。^③28日，日第八师团经过一周激战后占领南天门。30日板垣致电关东军，说该军的“勇敢作战”促使各反蒋派又活跃了起来，张作相、张敬尧、孙殿英、冯占海各部均将发难，宋哲元、沈克、方振武等部队将予响应，石友三将令其部下郑桂林在秦皇岛发难等等。^④这些相互通讯反映了关东军的作战与板垣的谋略活动在实践中的密切联系。但板垣

① 《现代史资料（7）》，第530页。

② 同上，第533页。

③ 同上，第533—534页。

④ 同上，第536页，538页。

所预告的21日北平政变（进攻南天门的关东军对此曾寄予殷切期望^①）及其他反蒋发动一个也没有成为事实，以作战推动谋略的计划一一落空。5月初，关东军与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磋商，决定取消“谋略为主，作战为副”的长城、滦东作战案，代以“沿长城作战”，“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这时板垣仍不断向关东军报告他策动华北内变的工作续有进展，关东军也一再对他鼓励、督促；他的特务机关5月中旬在唐山（16日石友三部下在此宣布“独立”）、天津、北平等地区策划制造了一连串骚扰事件，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但足以影响华北大局的内变却毫无眉目。事实上，日本侵略者的那种期望本来就很渺茫，而自5月7日张敬尧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我爱国志士枪杀^②、其手下的主要人员被逮捕后，板垣的谋划就已基本破产。5月21日，他致电关东军参谋长缕述他的谋略活动所碰到的种种困难，等于承认失败。22日，参谋本部致电关东军当局转告板垣结束天津特务机关，策变之事随即收场。此项谋略与作战相结合，成为日对华长城之战的一大特点。

日本侵华谋略由“为主”到“为从”到停止活动的过程，也就是其作战由“为副”到“为主”到主宰一切的过程。自5月初以来，关东军已按照上述关内作战方案加强了在长城沿线的进攻。7日第六师团重入滦东地区，侵占大片土地，进而西渡滦河，占领遵化、唐山等地。古北口方面，第八师团于12日夺取新开

① 《现代史资料（7）》，第534页。

② 当时邵元冲在5月8日日记中对此事有简要记述：“上午八时，至居仁堂访何敬之，知昨日六国饭店有一名常世古者被暗杀。其人实即张敬尧之化名，彼来平已有十余日，受倭夷之嗾使，得款二百万，扰乱平津，同谋者尚有陆宗舆、段鸿业、姚震诸人。张敬尧受任伪第二军团总司令，旬日前，因游说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不从，乃有暗杀于学忠之事发现。日内日军积极反攻，牵制我前线各军，尤竭力摧毁中央军，彼辈则定于日内在北平暴动，以便衣队数百人，携械冲入军事委员会分会，击杀何敬之，即宣布组织伪政府，仍奉段祺瑞为魁，率称伪临时大总统，并杀害各要人。其计甚险恶，且收买失业政客军人颇多。时机极迫，今日被狙击，创且甚重迨毙，则事变当可稍缓。”《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2页。

岭，次日占领石匣镇，进而略取密云，逼近通州。日军的两路作战都超出长城沿线而进入内地，造成威胁平津的态势；尤其是北平几乎三面被围，已处于日军的炮口下，日本飞机又接连到北平上空示威，更增加了这里的危机感。到5月22日，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决定撤往保定。这时日方抛出迫和条件，很快导致了停战及《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塘沽协定签字的过程完全是日方将战场上对中国的压迫扩大到会场上。关东军派其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少将为首席代表，级别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已含有使中国屈辱之意。5月31日正式会议开始，冈村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决定是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字了。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第一，它确定了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占领；第二，它在长城线与中国撤军线之间制造了一个停战区（非武装区），冀东至平北二十余县由此成为日本侵略者染指之地。攻占热河及长城之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的过渡，而塘沽协定就是它的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这个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以新形式进入一个新阶段。

分离华北

塘沽协定的签订也标志着日本分离华北第一幕的结束，这一幕的“谋略”手段没有收到多少成效，而作战的结果则留下了分裂中国的种子。这种子潜藏在因塘沽协定而产生的停战区内，两年半之后日本就得以培植其走狗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整个停战区（再加上察哈尔的延庆、龙关、赤城）纳入了这个伪政权的统治之下。

停战区是日本侵华的一个新创造、一种新形式。在这块中国领土上，中国的主权遭受破坏，残缺不全——因为按照塘沽协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区内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机关又“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装团体”。^①另一方面，停战区内山海关外侵入的关东军虽然撤走了，但依据《辛丑和约》驻扎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地的驻屯军丝毫不受影响，因而停战区内若干重要地点仍留有日军。这个情况再加上日本随时可以很容易从塘沽协定中找到干预的借口，就使停战区成为一个受制于日的特殊地区。这个地区的南缘（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一线）紧靠着北平、天津，又使华北这两大都市经常受着被并入停战区的威胁。

日本在蚕食河北省同时，又把利爪伸入了察哈尔。

察哈尔与河北一样，也与热河毗连，因而日军占据热河就成为既入侵河北、又入侵察哈尔的契机。与河北不同的是，察省境内很大一部分是蒙族聚居区，因而这里除了与伪满邻界的问题外，还有一个与分离满蒙相关联的民族问题。日本已把内蒙东部诸盟纳入伪满的范围，接着就要向其西部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察哈尔省（其辖境包括锡林郭勒盟及察哈尔部）。1933年4月底，当长城之战还在进行时，日本已开始利用伪军由热西向察东进犯，抢占军事要地多伦，侵扰沽源、宝昌等地。塘沽协定所定停战线西端为延庆（当时属察哈尔），这也为日本在这里侵略写下了伏笔。7月16日，关东军制定《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提出要“促进在内蒙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②8月，日本利用其“谋略部队”伪蒙古军李守信部巩固了对多伦的占领，关东军大力加强对多伦的经营，并在那里擅设“察东特

① 中日双方公布《塘沽停战协定》时这项规定没有公开。梁敬德前引书，第24—25页。

②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一）》，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47—448页。

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以李守信为“行政长官”。从12月起，日伪军又不断向沽源、赤城一带侵扰，还出动飞机轰炸，察东危机愈加深化。1934年10月发生第一次张北事件，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提出察东划界的要求，想在察东划出一块像河北那样的非武装区。中国不答应，日本就又伺机寻衅。1935年1月，伪满自卫团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热河丰宁与察省沽源边境发生冲突，日本强称中国军队“侵犯”了“满洲国”领土，它要“调派兵团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华军^①，随即出兵分路向沽源县城及独石口进攻。中国退让。2月，中日两军代表在大滩举行会谈，结局是议定中国军队不再“侵入”长城以东地区。从此察哈尔所辖长城线以东出现了一块面积700多平方公里的非武装区。

不久前一位日本学者在一篇“分析1931—37年日本政府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政策形成过程”的文章中提出一种说法：1934—35年之际“在中日之间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小康状态”。其论据是：1934年6月达成“满中通车协定”，7月签订“满中通邮协定”，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上发表“强调日华亲善，日本对中国不侵略不威胁的演说”，5月日中共同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6月国民政府发出了睦邻敦交令，“加强取缔排日运动”^②，等等。文章列举了这么些事，却忘记了上面刚叙述的日本那时在察东的种种侵略活动。另外，说到1934年，还不应忘记4月间东京通过天羽英二公然发表的那篇对中国及全世界带有威胁的谈话（天羽声明）；而到了12月，日本外、陆、海三省主管当局又机密地确定在中国要造成使“南京政权的政令达不到华北地区那样一种情势”^③。1935年1月、3月，关东军接连在大

① 吴相湘前引书，第175页。

② 卫藤沈吉：《日本政府对中国军事行动的虚实》，1990年8—9月“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关于所谓“满中通车协定”及“满中通邮协定”，实际情况是：1934年中日会商，实现了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但并没有带“满”字的通车、通邮协定。

③ 《现代史料（8）》，第22—24页。

连召开有日本驻中国各地的武官参加的会议，制定了分离华北、利用西南、使中国各地方势力与南京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政策。1934—35年之际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对中国的方针及真实态度如此，中日关系怎能说得上“小康”？1935年初广田在议会的那篇演说正是在日伪军向察东进攻的隆隆炮声中发表的，这本身就充满了辛酸的讽刺。不过南京政府还是对他的“亲善”姿态作出了真诚的响应，南京、上海的空气一时有所改变，中日两国使馆升格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实现的。^①但也恰在这时，日本分离华北之箭正将上弦，而到中国的“睦邻敦交令”发表时，那支箭已经射出了。

1935年5月底到6月，日本发起了一个分离华北的大攻势。这个攻势仍是两面进行，一面针对河北省，一面针对察哈尔。前者先发，出面的是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驻北平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他们以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及孙永勤义勇军进入遵化两事为借口，并指责蒋介石执行一面对日表示亲善、一面暗中准备抗日的两重政策，接连向军委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成立了所谓何梅协定。察哈尔方面日方以第二次张北事件为借口提出交涉，终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出场，逼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接受其全部要求，成立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突破了塘沽协定的范围，使日本的干预扩及整个河北省；秦土协定由延庆向西北延长了塘沽协定的中国撤军线，等于在察哈尔设定中国撤军区，并在该省全省范围内给予日本比在河北还要广泛的侵略权益。这两个协定的实质是从军事、政治、国民党党务等各方面削弱南京中央政府在冀察两省的力量，这是日本分离这两省的一种形式，也是从这两省入手分离华北的一个步骤。

与竭力排除中央在华北的势力紧密关联的是精心策划华北自治，这实际是一事的两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不久，8月6

^① 与中日外交关系升格同时，中英、中美、中德也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各国认为国民政府的统治已经稳定，所以纷纷提高与中国外交关系的级别，并非中日关系所独有，在中日关系中没有特别含义。

日本陆军省即指示在华北的驻屯军要把华北五省变成“不受南京政权政令左右的具有浓厚自治色彩的亲日满地带”。新到天津接任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根据这个指示在9月24日公然宣称：“要从华北清除国民党党部及蒋介石政权，还要借助于威势。……需要对华北五省自治联合体进行指导。”^① 10月间发生在香河县的短命“自治”是日本人执导的一次试演，也是一个信号，接着就是以土肥原为主角的大演出。他奉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之命并得到东京参谋本部的同意，于10月再次来华，使命就是策划河北自治及内蒙独立。他把重点放在宋哲元身上，他活动的高潮是要把那个“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强加给宋哲元，结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他设计的作为华北政权机关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未能实现，实际建立的是中国为对日妥协而提出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较小的范围内，他策动殷汝耕于11月2日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成为日本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汉奸傀儡政权。1936年8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以华北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为主要着眼点，在那里“完成分治政治”。^② 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出面一再促宋反蒋，成立冀察自治政府，与日本实行“经济提携”，但又归于落空。

在察哈尔，在内蒙，秦土协定刚成立，关东军就于1935年7月25日制定《对内蒙施策要领》^③，规定在该地区的活动是“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伴随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重点放在多伦和苏尼特右旗（德王故

① 转引自江口圭一《通向卢沟桥事件之路——十五年战争之一瞥》，载刘大年主编《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② 《现代史资料（8）》，第366—367页，368—369页。（中文译文见前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01—204页，204—206页。）

③ 同上，第492—496页。（中文译文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68—176页。）

乡），工作进程首先是培植德王、卓特巴札布（伪“察哈尔保安部队”长官）及李守信的实力，并“使三者暗中联合起来，排除汉人势力”；同时向绥远伸展势力，排除那里的各种“排日机关”，“使亲日派抬头”，等等。在扩大“亲日满区域”方面，首先是卓特巴札布的“保安部队”控制了第二十九军根据秦土协定撤出的察哈尔口外蒙族地区；接着又要进驻口外汉民居住区，12月关东军指使李守信伪蒙军向这里发起攻击，相继占领宝昌、沽源、张北各县，从此察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悉入日伪掌握，察境蒙区被遮断。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加紧拉拢德王，德王也加速投靠日本，双方的勾结日益加强。1936年1月关东军又制定《对蒙（西北）施策要领》^①，提出要组织并加强由德王掌权的“内蒙古军政府”，巩固其在察哈尔的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向绥远扩充，进而谋求向外蒙古以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伸展。2月，德王等在关东军支持下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秘密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4月，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札布等一起在西珠穆沁右旗索王府秘密召开所谓蒙古大会，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久也参加，大会通过“蒙古建国案”，决定成立“蒙古军政府”，德王任总裁。^②5月，这个所谓军政府在化德成立，其重要部门都有日本顾问通过“内部指导”加以控制。这实际上是为日本分裂中国服务的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内蒙古地区的工具。关东军扶植德王等扩编伪蒙军，8月驱使其骚扰绥东，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所部击退。11月，关东军利用其“谋略部队”王英伪军向绥东红格尔图大举进犯，遭到惨败；傅作义等军队乘势收复德王蒙伪军盘踞的重要据点百灵庙，日本利用代理人向绥远扩展的阴谋化为泡影。

日本分离华北经过两年策动，造成了冀察两省特殊化及华北

^{①②} 《现代史资料（8）》，第540—546页，551—554页。

危急。但它并没有完全满意，它所设计的华北“自治”或“分治”并未能完全实现，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并不能完全清除。^①对日本来说，华北问题还远没有根本解决。它不能听任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于是一种老办法又重新被使用：发动战争。

从七七到八一三：全面侵华战争

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华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单年的侵略往往比双年厉害，新的重大侵略的发动往往在单年，而双年则是这些发动的延伸、扩大或巩固。以1931、1933、1935年与1932、1934、1936年相比，可以看到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有的或许多少出于偶然，但整体上似乎反映了某种规律，这就是在不间断的侵略中有张有弛、有起有伏的规律。好比一头野兽，它既要不断地捕捉猎物，又要在每一次捕到之后用一定的时间去咀嚼、消化并寻找下一个目标，这样就必定形成一个个急与缓的周期。这时日本侵华的张弛、起伏大体上两年是一个周期。按照这个规律，1937年应是它发动新侵略的年份，而它果然发动了，这就是由七七开始的侵华战争。这可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的四赌国运。

七七之后不久又发生八一三，战争扩及上海。

这就不免使人回想起九一八之后发生一二八的事。

从日本方面看，八一三很有点象一二八的重演。重光葵事后追述道：“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成了事件之开端，中国军队同日本海军终于发生了冲突，形势同前次上海战争的爆发完全相同。当时甚至有这种风闻：只要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那末在上海就必定会由海军之手挑起某种事端。”^②所谓“前次上海战争”，指的就是一二八淞沪战争；所

① 继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撤销之后，另一个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军委会北平分会在日本压力下虽然也被撤销，但同时南京政府又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长官，从而仍维持了中央权力在北方的存在。

② 见前引《日本侵华内幕》，第130页。译文据原书174页作了改动。

谓“大山大尉在中国军用机场附近被杀”（这个说法太片面了），就是通常所说的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这很有点像当年的所谓日莲宗和尚遇害事件；所谓“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那末在上海就必定会由海军之手挑起某种事端”，可谓一语道破了真情。卢沟桥事变后第四天（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签署了一个《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里面一面说“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使用武力”；一面又说“但不得已时，应于青岛、上海附近保护侨民”^①，为在这两地用武留了后路。刚过了五天（16日），驻上海日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给国内的《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就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8月4日，他请求向上海逐次秘密派遣特别陆战队。8日，他遵照国内指示，为应付事态扩大做好一切准备而重新部署了兵力。9日发生上述虹桥机场事件，10日长谷川就决定增强海军兵力，命令在佐世保方面待机的部队开来上海（11日到达）。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说明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相杉山元表示同意。12日夜，日本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发出放手行动的指示。13日，内阁会议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②就在这一天，因日军先开火而在上海挑起了战争。事情很明显，八一三在日本方面完全是以海军为主有预谋有准备地造成的。当时平津已为日军占领，战争重心在华北，战斗正在那里激烈地进行着。在此情况下，任何一处新战场的开辟对华北战场都会起到支持、配合的作用。选择在上海这样一个有多方面重要性的地方，其含义就更加超乎寻常，难怪八一三以后昭和天皇亲自“屡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312页。

② 参阅伍宗华等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史长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2页；《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41—342页，346—347页。

屡催促增兵”。^① 总起来看，九一八和七七都发生在中国北方，前者在东北，后者则进入了华北；一二八和八一三都是为配合已在北方挑起的战争而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前者主要是策略上的配合，后者则具有了战略配合的性质。前后对照，可以看到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北起南应的规律，也可看到6年间日本侵华的大深化。

从中国方面看，八一三与一二八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对于一二八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抵抗完全是被迫的、被动的，而对于八一三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抵抗则是有预见的、主动的了。七七一个月后，在8月6日的国防会议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基于既定的“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策定守势作战时期的作战指导原则为：国军一部集中于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的天然堡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南京；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② 在此以前，担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在7月30日已向蒋介石等提出保卫上海应“先发制敌”之策，他在一道密电中说，当根据各种征候可断定敌将在上海发动无疑时，我军就应“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接受此策，复电说：“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③ 8月11日，南京政府命张治中率领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于当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围攻”。^④ 12日，张接连电蒋，先报告，“本军从贯彻扫荡淞沪日军之目的，即于本11晚，以已准备之火车、汽车输送现有军队至上海，置重点于江湾、彭整〔浦〕附近，准备

① 这是事后他自己说的，见《昭和天皇独白录》，载日本《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第106页。

② 转引自蒋永敬《对日抗战（一）——战争的起因与经过》，载贺允宣等《中华民国建国史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77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张电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3页。

对敌猛施攻击，进占敌军根据地而歼灭之”，接着，又请示先发制敌，掌握主动：“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元）日拂晓开始攻击？”蒋立即复电：“希等候命令，并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①由于蒋的这封电报而使得张预定13日拂晓前向日军发动的进攻未能实现，反而成了同天上午日军向华军开火。^②可见当时的形势已是一触即发。但不论如何，八一三时中国已下定在上海主动抗敌的决心，并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英勇壮烈的上海抗战坚持三个月之久，与这种主动抗敌的决心是分不开的。

综观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可以看到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一块块分离中国的六年。他们创造了多种分离的形式，基本的方式则是使用武力，并且归根结底是凭借着武力，所以军队和军人成为其各种活动的主力和主角。他们对中国的土地时而鲸吞，时而蚕食，一而再，再而三，充满了不灭亡中国不止的野心，几年间就把中国推到了危亡的边缘。这不但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也逼得一贯忍气吞声的南京国民政府渐渐改变态度：在北方，从九一八时的毫无抵抗变为热河之战中的微弱抵抗、长城之战中的英勇抵抗、绥远抗战中的有效抵抗和七七之后的全力抵抗；在南方，从一二八时的仓猝抵抗发展为八一三时有准备的抵抗；总起来就是从不抵抗到抵抗，从小抵抗到大抵抗，从被迫抵抗到主动抵抗。这反映了敌愈压而中华民族反抗之志愈坚，最后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引起中华民族的全面抵抗，它的四赌国运终于走向彻底失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5页。

② 张治中事后写道：“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整个一次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太可惜了！”他估计这是因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而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干扰了他的计划。《张治中回忆录》（上），第121—122页。